

# 新中国成立初期香港贸易危机与中英关系<sup>\*</sup>

聂 励

〔摘要〕香港贸易危机包含东西方对抗、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矛盾等诸多复杂因素，中英两国围绕香港贸易危机形成既斗争又合作的局面。战后英国对香港贸易管制的态度矛盾，其相关认知受到英美同盟的冷战思维、固守香港的殖民主义思想和经济现实主义交织影响。中国政府则区分对待香港治权和贸易关系，充分重视香港在外贸、外交和统战工作中发挥的作用，利用英美矛盾不断突破封锁禁运，维持贸易往来。贸易危机导致香港转口贸易迅速萎缩，但香港与内地的贸易业务从未中断。贸易危机助推中共领导人明确对香港问题的政策方针，同时削弱了英国在香港市场经济中的影响力，倒逼香港产业转型。

〔关键词〕贸易危机；贸易管制；香港；中英关系

〔中图分类号〕D232；F741.1；D82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21)-02-0098-15

## The Trade Crisis in Hong Kong and Sino-British Relation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ie Li

**Abstract:** The trade crisis in Hong Kong included a confrontation between East and West, contradictions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colonialism, and other complicated issues, and, based on this crisis, China and Britain were engaged in both struggle and cooperatio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Britain had a contradictory attitude regarding control over Hong Kong's trade crisis, which was influenced by the Cold War thinking of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alliance, a rigid attitude to the idea of a colonial Hong Kong, and economic realis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ifferentiated between the jurisdiction of Hong Kong and its trade crisis, fully emphasizing Hong Kong's rol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diplomatic and united front work, and it made use of British-American contradictions to continually break through the blockade and embargo and to maintain trade communications. The trade crisis led to a rapid shrinking of transit trade in Hong Kong, but there was never an interruption in the trade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interior. The trade crisis helped CPC leaders define their policy toward Hong Kong, and, meanwhile, it weakened British influence on Hong Kong's market and economy and forced a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 Hong Kong.

20 世纪 50 年代香港贸易危机是冷战初期东西方对抗所引发的重要事件，它既与中国对英美关系和香港问题的认知、策略有关，又与英国在中美两国间摇摆和妥协有关，折射了中英美特别是中英之间的较量。那么，在香港贸易问题上，中英双方各自诉求与分歧是什么？贸易危机的产生变化是否与中英关系的历史发展同步？危机对中英两国的香港政策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

在相关研究中，国内外学者主要集中于两方面探讨：一是对美国介入香港贸易问题及美英对华

<sup>\*</sup>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周边国家对华关系档案收集及历史研究”第二期子课题“冷战时期新马华侨华人多国档案整理与选编”（15@ZH009-02-07）的阶段性成果。

经济战的研究<sup>①</sup>；二是围绕中英经贸关系下的香港问题与新中国对香港市场供应政策的研究<sup>②</sup>。基于西方国家丰富的档案资料和便利的索取渠道，学界已经对英美特别是美国对香港贸易管制政策进行了大量深入的探讨，但也因此遮蔽了其他重要问题，其中最大的不足是未能深入剖析中英两国面对香港贸易危机是如何协调和应对的，导致对美国的影响和效果评价普遍过高。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又受到英国 100 多年的“殖民统治”，中英才是香港问题产生和解决的行为主体，只有厘清中英两国关系才能真正认识香港贸易危机。有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和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以中英两国有香港贸易管制问题的相关档案为基础，并综合其他历史文献，尝试论述中英两国在香港贸易危机问题上的博弈互动，以期更深入地揭示中英关系及其对港政策的实质。

## 一、香港贸易危机的酝酿与中英初步反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重返香港，从日本手中接过了对港统治权，此时的香港在英国内政外交方面的地位发生深刻变化。香港之于英国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突出的转口港地位，同时，港币也成为英镑区与美元抗衡的重要工具；英国也将香港视作进军中国内地市场的通道和桥梁，并希望以香港为平台培育在华英资企业；更重要的是，随着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香港对英国获取情报、遏制红色政权南下具有极大价值。因此，基于经济、政治和防务的需求，固守香港对于英国艾德礼工党政府极为重要。

此时中共领导人对香港的态度可概括为“暂时不动香港，维持现状”<sup>③</sup>。从 1947 年中共中央批复成立香港分局，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同步在港从事宣传和统战工作，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探索中逐步形成对香港问题的认识。1949 年 1 月 19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提到香港问题的解决思路，即“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sup>④</sup>。同年 2 月，毛泽东在与苏联特派代表米高扬谈话时明确说明“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sup>⑤</sup>即使当时苏联提出“这个城市有很多帝国主义特工”的质疑，中国政府也没有改变维持香港现状的想法<sup>⑥</sup>。从这一决断看，中国领导人没有将香港问题简单视为领土解放问题，而是充分考虑到保留

① 参见 Chi-Kwan Mark. (2004). *Hong Kong and the Cold War,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949 - 195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omas W. Zeiler. (2002). "The Economic Cold War: America, Britain, and East-West Trade, 1948 - 63".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9 (2); 于群、程舒伟《美国的香港政策（1942—1960）》，《历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郭又新《1949—1954 年美国对香港的经济防卫政策》，《东北师大学报》2000 年第 6 期；陈心竹著，翟亚柳编译：《中国和美国贸易禁运（1950—1972）》，《中共党史资料》2007 年第 2 期；等等。

② 参见 Wenguang Shao. (1991). *China, Britain and Businessmen: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 1949 - 57*. London: Macmillan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Ltd; James Tuck-Hong Tang. (1992). *Britain's Encounter with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 - 54*.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李世安《香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世界历史》1997 年第 2 期；王红续《毛泽东时代的中英经贸关系》，博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1999 年；欧阳湘、唐富满《从内地对港澳地区的出口供应看中国共产党的港澳工作方针（1949—1978）》，《中共党史研究》2012 年第 10 期；唐富满《中国政府对港澳地区出口的配额管理及早期实践》，《当代港澳研究》2013 年第 3 期；等等。

③ “暂时不动香港，维持现状”的设想在 1949 年 1 月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明确（见下文），但类似表述最早出现在 1946 年 12 月 9 日毛泽东同三位西方记者的谈话中“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207 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8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第 44 页。

⑤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第 380 页。

⑥ Chi-Kwan Mark. (2004). *Hong Kong and the Cold War,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949 - 195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28.

香港现状带来的好处，将香港历史、现实和新中国长远规划相统一。

随着中国局势的明朗化，西方阵营开始调整对华经济政策，以防止中国落入苏联手，对香港贸易的管控随之而来。1949年1月、2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分别颁布了NSC34号文件和NSC41号文件，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并要求盟友英国追随其对华贸易管制，而香港被置于与中国内地相同管制水平。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美国尚存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想法，加之扶持日本经济的需要，因此只对中国解放区采取有限贸易限制。不同于对苏联经济制裁，中国仍然具备进口非军事战略物资的自由。将香港划入管制范围，是“担心中国政府通过香港与英镑区进行贸易往来，从而为禁运物资流入中国开辟通道”<sup>①</sup>。不过，此时香港的地位还未得到美国重视，从1949年7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NSC55号文件看，美国并不打算动用武装力量来“保卫香港”，因为“这要承担卷入中国内战甚至全球战争的风险”<sup>②</sup>。英国对美国管制香港贸易的做法并不认同，香港是东亚地区联结各经济体的重要转口港，限制香港对内地的出口，不仅破坏香港的正常贸易，还会牵连马来亚和新加坡等英属殖民地利益，进而破坏英国在远东的整体布局。因此，伦敦官员承认自身对港英政府的监管不力，向美方表示将“对香港加强监督，不再允许运载军事物资的船只从香港转运到中国内地”<sup>③</sup>，但落实到对香港的具体行动，则不了了之。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的东亚政策面临调整，加速了美国劝说英国妥协的进程。10月11日，英美之间达成一致，英国政府同意加强对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的贸易管制，但管制的范围仅限于与军火装备及与战争潜力直接相关的“1A”物资，对于战略重要性稍次的“1B”物资，英国表示“将争取香港政府的合作”<sup>④</sup>。从英国对香港实施“有限禁运”的步骤看，英国最初对香港贸易管制是充满迟疑的。一方面，对香港实施贸易管制会严重影响到港币地位和香港市场稳定，在华英资企业现状和英国对进军中国市场的盘算决定英国不能与中国政府交恶；另一方面，英国评估中国对香港问题看法时，担心中国内地对香港采取军事威胁和政治宣传攻势，如果这时让美国参与香港防务计划，借美国获得联合国盟友的支持，势必能减轻英国的焦虑，英美同盟的利好得到彰显。为此，英方采取了尽量拖延的策略，对香港实施“有限管制”。

英方急于获知中国对香港问题的态度。1950年1月6日，艾德礼工党政府对中共领导下的新中国予以法理承认。通常认为，英国承认新中国是希望继续维持对香港统治，同时保留在华英资利益，也有官员指出是“因为新的政权是实际上控制整个中国的”<sup>⑤</sup>。但中英两国在国民党在港机构资产和人员归属问题以及英国、港英政府对台湾当局态度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建交工作暂时搁置。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未就香港问题发表正式声明，可从实际行动看，新政权没有立即收回香港的打算：从1949年10月广东战役开始，到1950年5月海南岛战役结束，深港边界发生过多次纠纷，华南和广东军政机关对边界问题采取了包括“保持边界平静”“避免边界纠纷”“后发制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谨慎处理边界事件<sup>⑥</sup>。1月29日，毛泽东在周恩来与英国驻中国临时代办进行中英外交关系谈判前提出“胡阶森来时应与谈

① “The British Embassy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an 5, 194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以下简称为FRUS), 1949, Vol. 9: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4, pp. 2-5.

② 于群、程舒伟 《美国的香港政策（1942—1960）》，《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

③ “Control of the Exports of Strategic Materials to Communist China”, Sept 9, 1949, F9124/1121/10, FO 371/75855. 本文使用的英国外交部档案均来自于亚当·马修公司开发的数据库《英国外交部档案：中国，1919—1980》(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19-1980)，为注释简洁，下文不再注明数据库名称。

④ “Proposed Control over Exports to China and Adjacent Areas”, Oct 11, 1949, *FRUS*, 1949, Vol. 9, pp. 880-884.

⑤ (英)亚历山大·葛量洪著，曾景安译，赵佐荣编《葛量洪回忆录》，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第214页。

⑥ 转引自刘蜀永《英国对香港的政策与中国的态度（1948—1952年）》，《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英国与蒋介石关系问题及建立外交关系的其他问题，而不要谈收回兵营问题。”<sup>①</sup> 英国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方暂时维持香港现状和保持香港稳定的打算，反映了两国对双边关系的重新评估和定位，这是香港维持与内地贸易关系的前提。

新中国外贸工作面临内外交困之局，旧有的经济秩序需要调整，西方封锁禁运亟待突破，这意味着对待香港贸易问题必须灵活变通。一方面，通过公私合营办法调整贸易形式，确保内地与香港贸易的畅通。1949年8月，陈云在上海财经会议上指出“我们要准备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当然，他们不可能把我们完全封锁死。从香港多少可以进出一些。广州解放后，南边即可有一条通路”<sup>②</sup>。为打破禁运限制，新中国贸易部门积极组织私营进出口商，通过联号经营发展对港澳大宗商品进出口，换购中国所需物资。针对农副产品的交易，则允许港澳边缘区小额贸易。1949年12月9日，华南海关处与广州市军管会贸易处联合发布《港澳边缘区肩挑小额贸易临时管理办法》，支持粤港居民开展商品交易<sup>③</sup>。另一方面，出台禁用港币和财经统一措施，整顿广东市面港币大量流通、黑市猖獗的现象。1950年2月3日，广州市军管会发出布告，宣布禁止港币及一切外币在辖区内市场流通使用及私相买卖<sup>④</sup>。布告首先引起进出口贸易私商恐慌，粤港贸易往来面临巨大压力。为照顾粤港两地群众利益，中国人民银行准予粤港商人兑换人民币使用，私商出口外汇在交易所议价成交，外汇归公，利润归私，使得出口量逐月扩大<sup>⑤</sup>。

应当说，英国对香港的“有限贸易管制”和新中国禁止港币流通使用的做法，对香港贸易业造成一定的冲击。但国民经济恢复初期中国对进口物资的巨大缺口，英国对中国内地和香港贸易价值的期待，加上港英当局和香港商人的内外联动，都将贸易管制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点。1949年至1950年期间，香港进出口贸易额增长超30%，其中增幅较大的是食品和牲畜类食料、机械和交通工具、化学制品等，而中国内地占香港贸易额增长超70%，充分体现香港与内地贸易的巨大互补关系<sup>⑥</sup>。

## 二、英国对华矛盾态度与香港贸易危机的扩大

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秩序整顿工作的阶段性完成，香港与内地经贸关系继续保持活跃。英国虽对香港实施一定程度的贸易管制，但主要集中于军火装备及弹药武器，对于非武器类的战略物资如橡胶、石油，还是可以由西方国家经香港转运到中国内地。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朝鲜战争爆发，且局势愈加朝着不利于英美关系的方向发展，英国才同意扩大对香港的禁运范围。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继续扩大对中国和朝鲜的禁运列表，对香港亦适用对华禁运政策。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美国对华全面禁运意图更为强烈。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商务部发布的全面对华贸易禁运文件中，提出所有出口到中国内地、香港、澳门的物资都必须办理相应的许可证，由此，香港与内地一同被置于美国对华全面经济遏制的许可证制度之下<sup>⑦</sup>。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外交态势，英国对是否要维持香港贸易现状表现出矛盾心态，这体现在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253页。

② 《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

③ 唐富满 《新中国成立初期内地对港澳市场供应的政策措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

④ 《叶剑英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589—590页。

⑤ 中国银行广州分行行史编写组 《广东中国银行历史资料汇编（1949—1989）》，1991年印行，第39页。

⑥ 华润贸易咨询有限公司编 《香港经济贸易统计汇编（1947—1983）》，1984年印行，第27、44、45、53页。

⑦ “Report by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of Actions Taken by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nd Defense and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on Trade with China”, Dec 4, 1950, *FRUS*, 1950, Vol. 6: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pp. 672 - 673.

对一些具体事件的处理上。

英国第一个矛盾点在于是否让香港加入东亚联合封锁禁运队伍。东亚地区既有英联邦国家和英属殖民地，也有美国盟友如日本和中国台湾。英国默许英联邦成员国与新中国开展贸易，但抑制港台间贸易。现在美国要求英国的香港政策必须服务东亚封锁禁运，同时单独放松对台贸易管制，这遭到英国一些部门的反对。从实际利益看，英国更重视新中国，维持内地和香港的经贸联系对保持香港繁荣和促进英属殖民地经济联系有关键作用，即便台湾属于美国阵营，英国也不敢贸然推动港台贸易，以避免中国内地的不满。英国甚至认为，即使实施了禁运，香港华人掌握的走私技巧也能让禁令变得暗淡无光<sup>①</sup>。英国交通运输部官员奥蒙德（W. P. S. Ormond）则向外交部表示，依照新规定，从香港进出的货物只要经过美国管控水域都须提供特别进出口许可证，这会给英国带来巨大麻烦。如果每一艘从事英联邦成员国内部贸易的英国商船，都要受到美国的强制管控，这不仅违背公认的国际惯例，也不符合英美领事关系原则。<sup>②</sup>

“海后号”货轮事件反映了英国在远东贸易问题上与美国的重大分歧。1951年1月，美国正式出台冻结中国资产的规定，载有中国进口公司订购物资的“海皇号”和“海后号”货轮随即遭到美方的拦截<sup>③</sup>。由于货物中包含大型电力设备、棉花、硫磺和多种药品，能帮助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抵御严寒，美国因此格外重视货轮的行迹。1月8日，美国国务院请求英国阻止轮船在孟买卸货，英国驻美大使馆回复：“英方无法要求印度贸易专员干预此事，我们只能做到向航运公司总部发出拒绝接收货物的请求。”<sup>④</sup>2月3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得知货轮有可能在香港和青岛停靠，再次向英国提出要求，督促香港对“海后号”货轮进行检查。英国外交部深知，“海后号”货物经由中国银行委托英国保险巨头劳合社（Lloyd's）投保，一旦货物被拦截，劳合社将向中国赔付巨额损失，英国财团不愿承担这样的风险。但如果此货轮在香港停靠后未及时拦截，英国必然遭受美国国会和新闻界的恶毒攻击。紧急讨论之后，英国内阁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港督拒绝此船停靠香港。<sup>⑤</sup>2月23日，英国驻淡水“领事馆”提供情报，“海后号”在台湾以东70海里至75海里处被国民党军舰拦截，并在基隆港卸货<sup>⑥</sup>。货轮注册方挪威很快通过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和美国驻台湾“大使馆”向国民党当局抗议，认为其没有理由扣留“海后号”，英国也对台湾的介入感到气愤，要求美国“克制国民党政权行动”。英国劳合社保险公司甚至派代表前往台湾，与国民党当局协商能否追回部分货物。<sup>⑦</sup>挪威政府和英国公司的申诉令美国不满，国民党拦截“海后号”是美国默许支持的结果，而货物一旦退回，就有流入中国内地的风险。英国也意识到劳合社公司赴台追偿的后果，即英国必须对香港实施更为严厉的贸易管制手段。维护香港贸易还是维护英商权益是个两难抉择，“海后号”货物最终在英国驻淡水“领事馆”与台湾当局的谈判下运出一部分，英国劳合社保险公司也对中国银行作出部分理赔<sup>⑧</sup>。“海后号”事件以后，英国政府在禁运措施上更显被动，港台贸易被列入考虑范围，而对华贸易管制问题则陷入更复杂的困境之中。

① “Trade with China through Hong Kong”, Apr 30, 1951, FC1121/104, FO371/92276.

② “Letter from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to the Foreign Office”, Dec 7, 1950, FC 1121/2, FO 371/92272.

③ 《中国银行行史（1949—1992）》上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第79页。

④ “Secret telegram from Washington to Foreign Office”, Jan 9, 1951, M346/15, FO 371/92273.

⑤ “Supplementary Memorandum to the Foreign Office ‘HOI HOUW’ ss”, Apr 2, 1951, FC1121/145, FO 371/92277.

⑥ “Restricted message from British Consulate in Tamsui to Foreign Office”, Feb 23, 1951, FC1121/99, FO 371/92275.

⑦ “Secret telegram from Staff Officer (Intelligence) Hong Kong to Director of Naval Intelligence, Admiralty: List of Cargoes Carried by the M. V. HOI HOUW”, Mar 9, 1951, FC1121/147, FO 371/92278.

⑧ “Telegram from China and Korea Department of Foreign Office to British Consulate in Tamsui”, Jul 5, 1951, FC1121/279, FO 371/92283.

英国的另一个矛盾点在于是否要将香港有限禁运调整至全面禁运。1951年1月，中朝军队在朝鲜战场上取得第三次战役胜利，美国再次将矛头指向英国的香港政策。同年5月，“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中列举从2月至3月间香港出口到中国内地的化工、机械、石油制品数量，并猛烈抨击香港作为“走私”通道为中国和苏联运送了大量来自马来亚的橡胶，这在美国引起广泛同情与支持，英国陷入美国社会舆论的旋涡。<sup>①</sup>“麦克阿瑟演讲”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内部对香港贸易管制问题的讨论逐渐形成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是，殖民部、国防部等部门继续反对对香港贸易管制。殖民部注重对香港损失的评估，包括中国内地采取对港中断食品物资供应来施加报复、依靠原材料供应和化工制品生产的香港企业遭受重创后引发失业率攀升、香港对内地直接贸易和转口贸易切断后财政收入的下降、社会稳定问题以及华人商铺、华人银行和航运业损失等风险<sup>②</sup>。国防部认为对华经济战会引起中国政府的反击，如扣押外国船只、实行海上封锁，中方一旦获得苏联的支持，则会增加印支半岛、缅甸和暹罗遭受共产主义袭击的风险<sup>③</sup>。另一种声音是，以外交大臣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Stanley Morrison）为代表的官员提出有限度地提升对港贸易管控，只要不全面对港禁运，中国内地就会期待从香港获得西方的物资供应，进而考虑与英国坐下来谈判<sup>④</sup>。英国驻美国使领馆注意到美国民众反英情绪的高涨，力主英国应避免战场上“联合国士兵”的牺牲而适当放弃商业利益<sup>⑤</sup>。尽管两派辩论难分高下，但本质上都反对对香港全面管制，只在禁运的程度存在差异。

“海后号”和“麦克阿瑟演讲”事件后，港英当局追随美国颁布的《1950年特种货物禁止输出令》《“有关管制战略物资输出”的加强命令》<sup>⑥</sup>，升级了香港管制法令，包括出台《对北朝鲜禁止输出令》《部分西药不准输出令》等。港英政府工商业管理处宣布扩大输出统制范围，将列表再次扩充至19项，包括金属、电器器材、摄影器材和燃料等5大类，英国预估此举能消解美国对港歧视态度<sup>⑦</sup>。但美国的后续行动令港英当局深表不满，首先是对许可证制度执行的困惑。香港企业向美国总领事馆申报合理的进出口许可证，美国政府表现十分拖延。例如，香港联合贸易公司长期向美国威尔顿钢铁公司（Weirton Steel）采购锡料和废钢板供香港的搪瓷厂使用，此产品不在清单列表中，但在申请特别许可证时多次遭拒。这造成香港原料供应商风险增大，银行业出资贷款意愿下降，香港业界信心遭动摇。<sup>⑧</sup>其次是力争美国放开“非正面列表”（the Non Positive List）项目。“非正面列表”是那些不会引起中国和朝鲜军事力量提升的商品，港督葛量洪向美国请求放开对“非正面列表”的配额限制，并及时向香港除“正面列表”外的商品发放许可证，在数量上“非正面列表”也要达到1949年香港进口本地消费品的75%，否则香港社会难以维持稳定<sup>⑨</sup>。再次，对美国

① Chi-Kwan Mark. (2004). *Hong Kong and the Cold War,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949 - 1957*, pp. 152 - 153.

② “Inward Telegram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to Hong Kong ( Sir A. Grantham )”, Jan 9, 1951, FC1121/30, FO 371/92273.

③ “Note by the Secretary: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the Application of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China”, Fed 10, 1951, FC1121/102, FO 371/92276.

④ “Control of Exports from Hong Kong to China”, Jan 15, 1951, FC1121/37, FO 371/92274.

⑤ “Letter of Mrs. J. E. Harrington to Foreign Office Secretary of British”, Mar 10, 1951, FC1121/141, FO 371/92277.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中），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448页。

⑦ 李敏生《患难之交——抗美援朝霍英东历史解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7—58页。

⑧ “Inward Telegram from Hong Kong ( Sir A. Grantham )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Jan 11, 1951, FC1121/25, FO 371/92273.

⑨ “Inward Telegram from Hong Kong ( Sir A. Grantham )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Jan 30, 1951, FC1121/61, FO 371/92275.

过分关注香港表示不满。葛量洪认为香港贸易中双边贸易份额很少，绝大部分货物来源地并非香港，而是其他国家，因此最需要接受贸易管制的是货物来源国。葛量洪认为，当前国际社会对香港的敌意过高，反倒为其他地区开辟漏洞，加强对中国澳门、日本和加拿大的管制势在必行。<sup>①</sup>

针对香港贸易管制存在升级的可能，中国内地在“反封锁、反禁运”斗争中也加强与香港开展贸易的内容。一方面，对组织机构进行明确分工。1950年8月，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香港贸易机构统一领导方案，规定在政策和业务上由中央贸易部统一领导，人民银行和交通部提供金融和海运方面的配合<sup>②</sup>。香港管理委员会承担发展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经济资料搜集和培养干部的任务<sup>③</sup>。另一方面，实施对香港及资本主义国家反封锁的对策。1950年12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提交的针对美国对华战略物资封锁七项对策得到中央批准，对策中包括“向西德及其他欧洲国家所订的货物及英镑区的订货，应尽速抢运”，“改变今后在国际贸易上的做法，一般的采取易货办法”，“尽量缩小与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结算差额，以减少贸易外汇遭受冻结的危险”，“关于‘退购’、‘转存’、‘转装’三种办法，我们先应暗自进行”<sup>④</sup>。1951年1月29日，国家外管局公布《先进后出易货临时管理办法》；2月26日，中央贸易部颁布《易货贸易管理暂行办法》<sup>⑤</sup>。国内各部门争分夺秒抢购、抢运、转售、退购物资，力图减少封锁禁运造成的损失。

“抢购抢运”吸纳了沿海省份、国营企业和个体商户广泛参与。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在香港组建的华润公司，成为中国内地各进出口公司在香港的总代理。禁运前，华润公司业务范围主要是华南地区和东南亚，香港出台禁运法令后，华润在印度建立宝元通公司，从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地抢购棉花和橡胶等物资。<sup>⑥</sup>为保证内地对香港农副产品的供应，外贸部门于1951年在香港成立五丰行，专门从事内地对港农业贸易。广东省与香港往来密切，私商比例高，中国银行广州分行便推出进出口贷款和埠际出口押汇，提升外商特别是港商的办事效率。广东海关和外汇管理局等部门则组成反禁运、反封锁联合办公室，共同扶助私商争取禁运物资通过香港进口，实现公私双方有效配合。<sup>⑦</sup>此外，香港个体商户也在与内地商行交往中寻求管制漏洞，比如订购美日货物，以禁运地区以外的商行名义签订合同，从美国出口时先运至“禁运”地区以外的口岸，运输工具选择非美注册的轮船及飞机，且不取道美、日等国口岸，效果显著<sup>⑧</sup>。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配合保证了内地与香港贸易的持续性。

对于英国指令香港对内地禁运石油、西药等19种物资，以及在香港制造的如“永灏号”邮轮事件和“两航”案判决，中国政府实施了相应的反制措施，包括启动对在华英资企业的大规模清理和征用亚细亚煤油公司。但客观来说，此时两国并未完全交恶。1950年6月16日，周恩来指示中共中央华东局“英轮如在我领海内遭遇敌机空袭或其他危险，我应予以保护。但如我力量不足，则可准其在港内避难，并应予以必要之便利。”<sup>⑨</sup>1950年底，斯大林告知毛泽东英国已经停止对苏出售自然橡胶，故请求中方转售于苏联。周恩来对此表示“目前应鼓励胶皮厂私商运用各种关系

① [英] 亚历山大·葛量洪著，曾景安译，赵佐荣编《葛量洪回忆录》，第211—212页。

②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32—233页。

③ 香港管理委员会设立于1949年12月，是中央办公厅香港委员会在香港的管理机构，其对内称“港管委”，对外是“华润公司董事会”。参见《红色华润》，中华书局，2010年，第125页。

④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第656—657页。

⑤ 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编《新中国海关》，海关总署上海印刷厂，1951年印行，第188页。

⑥ 《红色华润》，第155—156页。

⑦ 《广东中国银行历史资料汇编（1949—1989）》，第39、43页。

⑧ 《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中），第592页。

⑨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08页。

进口橡胶，我们贸易部也应努力争取迅速进口”<sup>①</sup>。这表明中国仍具有从香港采购橡胶的可能性，也折射英国在香港橡胶贸易管制上的不彻底。

香港这种贸易状况，刺激中英两国在东南亚建立合作。马来亚和新加坡是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也是南洋华侨聚集之地。在英国的默许下，1950年2月，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接受了中国银行新总管理处的领导，与台湾“中国银行”断绝联系<sup>②</sup>。同年6月，中国政府又顺利接管了中国银行马来亚经理处。香港贸易管制扩大后，中国人民银行派出“巡视团”赴新加坡考察，通过调查研究和宣传教育，与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加强联系，进一步打通新加坡经由香港连通中国内地的贸易与外汇渠道。<sup>③</sup>由于朝鲜战场交战双方对战略物资需求的增大，马来亚橡胶出口一度从每吨1500美元涨至3800美元，锡矿价格从每担350美元涨至530美元，为英镑区赚取大量外汇收入<sup>④</sup>。中英在新马地区的配合，为两国解决眼前的实际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相比之下，中英关系远不如美苏关系那般敌对，中英的经济利益让两国间维持着既对抗又合作的微妙关系，这种政治默契一定程度弱化了贸易管制对两国造成的负面影响。

西方对华禁运扩大期间，香港在向内地货物转运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即便管制有所升级，但这些措施实际产生的效力并不大，只是增加中国进口货物的“黑费”负担。从香港对内地贸易数据看，1950年第二季度到1951年第二季度，香港进出口额不仅没有下滑，反而呈现显著提升，其中香港对内地出口额增长率一度超过50%，石油产品交易额下降，但通过香港转口至内地的马来亚橡胶大幅增加<sup>⑤</sup>。香港贸易的繁荣一方面印证了中国内地充分利用香港开展海外贸易所取得的成效，另一方面说明英国对香港开展与内地贸易的支持心态，中英两国在香港的经济利益大过政治分歧，这为香港带来危机升级前的短暂繁荣。

### 三、香港贸易危机的升级与中英两国较量

有限禁运条件下中英两国均默许维持香港贸易。英国深知香港的繁荣是维持英镑区稳定和英国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保障，香港为英国在东南亚保持地位和影响力，还能成为对新中国展示资本主义成就的橱窗。中国内地注意到香港禁运问题中的英美分歧，故而在依托香港开展与海外贸易的同时，将香港视作离间英美关系的工具。1951年周恩来在向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追溯中央处理香港问题思路时指出：“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战略部署的一部分”，“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我们反而主动”，“我们就拉住了英国，使它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战略部署跟得太紧。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英美在对华政策上的矛盾”<sup>⑥</sup>。但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节节胜利，英国对香港贸易管制的态度发生变化，直接导致香港贸易危机升级。

为进一步封锁和孤立新中国，美国将香港视作观察中国内地的阵地，不断扩展美国驻香港总领馆的规模与权限。从1950年到1951年，美国驻香港总领馆的职员从67人增加到96人，派遣人数超过美国90%的驻外使馆<sup>⑦</sup>。美国总领馆的快速膨胀使其对香港贸易的干预行动扩大。1951年4月以后，美国总领馆以美国品牌商品的代理权为由，向香港商业公司施压，威胁其终止对内地贸易。

①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第534页。

② 《中国银行行史（1949—1992）》上卷，第31页。

③ 《中国银行行史（1949—1992）》上卷，第36页。

④ Francis Loh Kok Wah. (1988). *Beyond the Tin Mines. Colliers, Squatters and New Villagers in the Kinta Valley, Malaysia c. 1880 - 1960*,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40.

⑤ “Seaborne Trade with China”, Nov 29, 1951, FC1121/357, FO 371/92287.

⑥ 转引自张晓京、齐鹏飞《“长期打算 充分利用”——中共对港问题八字方针确定始末》，《党史博览》1997年第7期。

⑦ “Staff of U. S. Consulate General at Hong Kong”, Set 27, 1951, FC1905/9, FO 371/92385.

港督葛量洪对美领馆的行为提出抗议，但英国外交部官员主张推迟诉讼<sup>①</sup>。1951年5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美国操纵的对中朝禁运案。此前英国尝试延缓美国在联合国对华集体制裁行动的失败，加上此次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英国最终选择对美妥协。英国驻联合国代表杰伯表示“关于禁运问题的分歧，只是存在于实行禁运问题的日期上而已。”<sup>②</sup>为配合英国对华禁运政策，港英政府于6月20日颁布了《1951年禁止出口（特定物品）法令》和《1951年禁止进口（特定物品）法令》，其严厉程度大大超过1950年法令，《对华禁运项目清单》也更为具体和明确，清单中的13种类别基本涵盖了军事战争设备和工业建设的重要物资<sup>③</sup>。

英国升级对香港的贸易管制，表面是对美国的屈从和让步，实质是在自身实力下降的现实和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目标之间追求平衡的结果。首先，战后英国黄金储备亏损严重，伦敦当局设想过开拓中国市场来平衡贸易逆差，但随着“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逐步落实，新中国外贸重心转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在华英商及其投资不得不撤离中国内地。英国只有通过削减美元货物进口、扩大美元区域商品出口的方式，才有可能缓解自身财政困境，英国有求于美国降低高额关税。其次，解放战争时期港币在内地流通，曾对英镑体系的稳定发挥积极作用。1950年中国银行颁布《禁止外币流通使用》，减少了港币的流通，而美国在西方阵营推行的“马歇尔计划”，又迫使英国同意通货的局部流通，这对英镑国际地位产生不利影响，英国寄希望于美国作出适当让步<sup>④</sup>。再次，保守党上任以后，丘吉尔提升了“三环外交”中的“英美同盟关系”的地位，将追随美国与压制殖民地解放运动结合在一起。而1951年10月美国总统杜鲁门签署批准的《巴特尔法》<sup>⑤</sup>更是让英国意识到香港问题上美国无法缺位的事实。因此，英国内阁肃清了各部门之间不同意见，在香港贸易管制问题上发出一致声音。此后，港英当局继续颁布了《1952年输出〈禁制〉（规定物品）（补充）法令》和《1952年输入〈禁制〉（规定物品）（补充）法令》，进一步扩大了对香港石油化工、交通设备和橡胶物资的管控范围。

港英政府追随美国政策愈加趋近，全面对华禁运体系形成。中国外交部对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中朝禁运案予以严厉斥责，对于英国追随美国的行为进行抗议<sup>⑥</sup>。除了外交上的努力，中国也着手改进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方式。在货物选择上，中央贸易部于1951年2月颁布了《易货贸易管理暂行办法》，将进出口货物按重要程度分为甲、乙、丙三类，其中甲类重要出口货物有桐油、猪鬃和皮毛等，甲类重要进口货物有橡胶、棉花和钢材等。易货贸易以进出口平衡为原则，根据类别采取先进后出或分批同时进出。<sup>⑦</sup>在贸易手段上，采取“统一谈判，分头交易，即让海外私商与中共驻港机构进行统一谈判，由组织依照统一谈判条款，分购分销售，各负盈亏”，同时“组织长期

① “Telegram from J. B. Sidebotham, Colonial Office to J. F. Nicoll, Colonial Secretariat, Hong Kong”, Jun 6, 1951, FC1905/7, FO 371/92385.

② 《美帝国主义无法挽救侵略朝败局 操纵联大非法通过对我禁运案》，《人民日报》1951年5月22日。

③ 第1类：军火、炸药、战争器材，包括飞机及引擎；第2类：原子能材料及设备；第3类：石油产品，原油及其提炼产品，石脑油、矿物油、溶剂；第4类：运输装备，包含内燃机、所有汽车等10类；第5类：金属矿产及其制成品，包括各类钢铁产品等5类；第6类：橡胶及橡胶制品，包括天然橡胶等4类；第7类：化学品，包括化学战争设备等13类；第8类：用于探测矿产及矿苗的化学品；第9类：制造硫酸所用的接触剂；第10类：化学、石油设备及工厂，包括制造毒气用品等5类；第11类：电子设备，包括雷达及其他无线电侦察设备等6类；第12类：精准科学仪器，包括对战略方面研究如原子能的重要实验室设备等3类；第13类：其他各类机械及零件，如金属机械工具等12类。参见“Prohibited Export List: Items Subject to Embargo for China”，Jun 12, 1951, FC1121/259, FO 371/92282.

④ 《英联邦总理会议反映出英美矛盾》，《人民日报》1952年12月26日。

⑤ 《巴特尔法》（Batte Act）即禁运法案，是美国众议员巴特尔（Laurie Calvin Battle）所提出并由美国国会通过的一项法案。其规定：凡是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如果在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方面违反美国关于“禁运”的规定，美国就要停止对它们的“援助”。

⑥ 《美国操纵联大非法通过对中朝禁运案 我外交部发言人严予斥责》，《人民日报》1951年5月23日。

⑦ 张夏婷《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易货贸易研究（1950—1952）——以华南区为例》，《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5期。

性的公司，即按商人行业，集中资金、组织公司，专营中国土产品，大批成交、包销、代理、经销，对华商进行集体团结利用”<sup>①</sup>。华润公司作为对外贸易的总代理，在进出口价格方面一直坚持“一个窗口”“统一对外”<sup>②</sup>。将中国出口国际市场的重要战略物资进行限制，是对英美等国对华禁运的等价回应。易货贸易开展的主要平台还是设在香港，5月中财委下发的《关于美帝操纵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对我实行禁运案后对各项工作的指示》，强调将外贸工作重点转移到华南，利用香港作跳板，多做小宗买卖，积少成多<sup>③</sup>。

中国政府继续将香港作为海外贸易渠道的判断依据是：香港必须依赖内地市场，当前港英政府对内地实施的“封锁边区令”“输出入新管制法”是英美胁迫，并非自身意愿的选择，加之粤港之间绵长的边境和海岸线，都能成为突破封锁的有利条件。许多爱国港商积极寻找禁运管制下的漏洞，拓展重要物资运输的新渠道。由于澳葡当局软弱无力，澳门成为内地突破“禁运”物资的中转站。禁运商品转运到香港以后，通过水道运往澳门再进入内地，转运过程中，以霍英东为代表的港澳商人和香港“水上人家”发挥了重要作用。香港实施新管制法令后，澳门对内地贸易总额一度攀升，其中石油、钢铁材料、汽车轮胎、药品等成为主要运入货物<sup>④</sup>。另外，新马等华人较多的地区也加入突破国际“禁运”行列。1951年7月，新加坡情报官员在向英国远东部总参谋提交的报告中指出，新加坡、古晋出发的货轮往往会开至曼谷或苏门答腊港口卸货，再换船运送到香港进入内地。由于对公海海况的熟悉，船只几乎不会受到英国海军的袭击和干扰。<sup>⑤</sup>为应对港英政府切断与内地的外汇交易，中国外贸部门增加易货贸易批汇，按需要程度决定是否从香港进口，而银行随即改变港币贷款条件，采取灵活的结算方式，并通过中国银行海外分行吸收存款，支持反冻结斗争。1952年6月，中央提出对香港贸易工作的方针：“大力巩固和继续维持对港澳的出口贸易，并且要充分利用这个跳板，积极开展我国对东南亚的出口贸易和对远洋进出口贸易，开展对未建交国家的贸易活动。”<sup>⑥</sup>这意味着中央对港贸易目标及其作用延伸至整个外贸工作甚至外交工作。

贸易危机的升级对香港影响巨大。禁运和管制的全面铺开首先冲击了香港金融市场。由于进口货品价格的急剧上升，西药、五金、机器和化工原料等市场出现投机、囤积现象；港商对美、日和欧洲国家的订单迅速下降，洋行业务出现停顿；美汇和美钞惨跌，伴随银行收缩信用贷款，导致工商界大面积陷入周转困境。贸易商的信用状赎单问题和原料涨价引发的交订货问题成为摆在港商面前的两大难题。<sup>⑦</sup>更大的冲击体现在贸易方面，对内地贸易管制以后，香港转口港优势几尽丧失，对内地出口量急剧下降，连同香港对西欧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额也大为减少。英国为缓解香港贸易萎缩困局，在美国的支持下与日本签订了《英日支付协定》，希冀开拓对日贸易来维持香港的经济。香港对日贸易的上升为日本商品抢占香港市场提供契机。工业领域，香港制造工业的原料多仰赖美国。美国宣布禁运后，香港众多厂家因原材料问题被迫停工或关厂。

面对香港经济遭受的巨大损失和引发的社会连锁反应，英国贸易委员会注意到日本在中国内地和香港贸易份额扩大，并有可能挤压掉英国在远东的利益<sup>⑧</sup>。持同一观点的还有港督葛量洪，他在

---

① 《团结利用港澳华商进一步扩展对港澳及东南亚的贸易问题》（1957年4月18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25-1-373-047-051。

② 《红色华润》，第141页。

③ 《陈云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00—101页。

④ 《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中），第602—603页。

⑤ “Telegram from Staff Officer (Intelligence) of Singapore Area to Chief Staff Officer (Intelligence) of Far Eastern Station”, Jul 23, 1951, FC1121/318, FO 371/92285.

⑥ 《对港澳贸易座谈会总结》（1956年6月5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25-1-335-001-008。

⑦ 《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中），第593—594页。

⑧ “Letter from Japan Association Secretary to the Under-secretary of State, Foreign Office”, Oct 18, 1951, FC1121/347, FO 371/92286.

写给殖民部秘书处的报告中指出“香港是贸易管制中的最大牺牲品。美国有意以牺牲香港为代价来强化日本工业出口的繁荣。在英联邦内，香港则要完成远比其他成员国复杂得多的出口许可管制流程。”<sup>①</sup> 英联邦集团内部也对香港贸易管制表示不满。印度外交部强调，如果联合国将黄麻及其制成品列入对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禁运列表，那么印度将在 1.5 万吨黄麻换购 20 万吨中国粮食的协议中面临违约<sup>②</sup>。锡兰不是联合国成员国，在禁运背景下，锡兰陷入橡胶滞销和大米短缺的困境，更不愿意中止对华贸易，特别是橡胶贸易。缅甸与中国的贸易通道一度引起美国注意。美国驻缅甸大使基（Key）威胁称，缅甸作为联合国成员国，如果受到攻击，联合国将给予援助，但如果没有履行决议，就将承受丧失联合国同情的风险。缅甸外交部常任秘书长吴敦贤（U Tun Shein）对此置之不理。<sup>③</sup>

损失较大的还有英属马来亚和新加坡。朝鲜战争爆发初期，中国对新马的橡胶和锡矿石需求巨大，贸易限制升级以后，香港从新马进口额从 1951 年的 3.94 亿港元降至 1952 年的 1.64 亿港元，直接引发马来亚联合邦政府的财政赤字<sup>④</sup>。1952 年 6 月，马来亚高级专员邓普勒（Gerald Templar）前往英国议会演讲，向伦敦官员倾诉资金的缺口导致马来亚的困难<sup>⑤</sup>。经济问题激化社会矛盾，撼动了英国殖民者的统治地位。总之，在香港禁运问题上，英国出于维护英美特殊关系目的对美妥协，一定程度弥合了此前英美同盟关系出现的裂缝，但也对香港经济社会造成巨大打击，激化了英属殖民地和英国之间的矛盾，香港贸易危机的升级使得英国陷入更大的内政外交困境。

#### 四、中英两国协调与香港经济复苏

港英政府 1952 年出台补充性禁止进出口法令后，香港贸易危机全面升级，这引起中国、英国及香港工商界的强烈不满。英国塞缪尔钢铁有限公司（Samuel Osborn & CO., LTD）长期为上海洪记工业公司供应钢板材料，并通过香港贸易公司转运。禁运实施后，英国在港公司难以从美国获得进口许可证，运输条件无法达标。塞缪尔钢铁公司为促成生意，多次致电港英政府启动“例外程序”，以香港本土民用物资的名义进行货物采购。<sup>⑥</sup> 香港商业组织如香港中华总商会、中华厂商联合会、五金商业总会、中华纸业商会等，也积极团结港商，凝聚共识。英国曼彻斯特商会在香港制造业和航运业领域有重要影响力，其在英国议会上提出“在港英商获取原料困难是导致香港经济陷入困境的直接原因”<sup>⑦</sup>。而包括怡和（Jardines）和太古（Butterfield）公司在内的老牌英商，均对香港与内地开展无限制的贸易行为持完全正面的评价<sup>⑧</sup>。

1952 年 4 月，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召开，这是贸易禁运下东西方国家进步人士呼吁召开的一次特殊会议，香港的新老英商希望通过此次会议恢复与中国内地发展贸易的自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参加此次会议，会议期间与英国经济学家、工农业和商业家等进行了讨

① “Inward Telegram from Hong Kong ( Sir A. Granth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Aug 28, 1951, FC1121/321, FO 371/92285.

② “Inward Telegram from U. K. High Commissioner in India to Commonwealth Relations Office”, Jun 8, 1951, FC1121/220, FO 371/92280.

③ “Letter from British Embassy in Rangoon to South-east Asia Department of Foreign Office”, Jun 30, 1951, FC1121/281, FO 371/92283.

④ 《香港经济贸易统计汇编（1947—1983）》，第 30 页。

⑤ “Visits to London in June 1952, December 1952, and May 1953 by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General Sir Gerald Templar”, Dec 6, 1953, Malaysia National Archive, 2013/0001094.

⑥ “Copy Letter from Hung Chi & Co. Shanghai”, Aug 13, 1951, FC1121/319, FO 371/92285.

⑦ “China Association”, May 20, 1953, FC1106/8, FO 371/105238.

⑧ “British Ships Trading with China”, Jan 6, 1952, FC1121/365, FO 371/92287.

论，并与英商签订了1000万英镑的贸易协议。南汉宸指出，中国政府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恢复与英国贸易关系，英国政府对华贸易歧视政策是阻碍两国及两国人民的正常经济关系的主因。<sup>①</sup>《中英贸易协议》的签订是英国工商界对中国市场巨大潜力的肯定，强化了英商反对对香港贸易管制的决心。此次会议后，中国内地重开与香港及英国直接或间接贸易的渠道，英国社会和香港英商要求解除贸易禁运的呼声更加强烈。

1953年初，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新一届总统。他在评估朝鲜战争的形势后，开始主动调整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3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讨论NSC152/3文件时，谈及缩小对华禁运范围的问题，这表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物资供应清单有望扩大<sup>②</sup>。但是文件并未提及对香港贸易政策的调整，反映了美国此时不急于讨论香港管制问题。不过，英国外交部认为，在对华贸易管制出现松动之际，正是试探美国对香港禁运态度的最好时机。与此同时，港英当局着手考虑提振香港对内地货物出口信心，有意松动现行的贸易管制。为挽救萎缩的香港航运业，香港航运公司尝试采用“全权租船契约”方式，通过分离船舶所有权和使用权，将香港的货运船只租赁给中国贸易公司，避免禁运系统对在港船只出入的束缚<sup>③</sup>。根据联合国决议的规定，在英国或香港注册的船只未获得许可证是不允许进入中国或朝鲜海域的，但伦敦的默许与中方的配合，为香港打破贸易禁运打开了一个缺口。同年7月中朝美三方签署停战协议，朝鲜战争结束。英国政府判断与中国政府讨论放松香港贸易管制的时机成熟。英国外交部提出希望港英政府出面，以香港商会名义邀请中国商业代表团来港洽谈非战略性物资的贸易合作。这种半官方的访问团有利于缓和英国和中国紧张的政治气氛，经贸关系的加强能冲淡外交尴尬局面。英国贸易委员会之后提出在药品方面放开贸易管制，到1953年底，英国政府同意正式废除香港对内地药品如抗生素、磺胺类药物的出口限制<sup>④</sup>。英国自下而上撬动了对华禁运的阀门，香港对内地贸易范围逐步扩大。

香港贸易危机的缓解大体建立在中英关系缓和的基础之上。1953年6月，英国贸易代表团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邀请下来华进行访问，中国对外贸易部、外交部、中国进出口公司和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组成招待组，英国代表团成员中包括信昌机器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默塑。信昌集团在香港贸易界很有威望，高默塑来访的重要目的就是破除香港对内地贸易壁垒。<sup>⑤</sup>实际上，信昌集团一直在促进中国对外贸易方面表现积极，中方也对此类英商采取灵活务实策略，即便禁运期间也未中断与之合作。经贸关系的改善深化了中国领导人对香港统战和外交方面的认识，“暂时不动香港”的思考进一步加强。1954年8月，周恩来在为接待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而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提到“不成熟的问题，也不要谈，例如香港问题。”<sup>⑥</sup>

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形成时期，外贸部于1954年10月召集扩大对港澳出口工作会议，确定了对港澳出口供应方针，包括积极扩大对港澳出口及经港澳转口东南亚的贸易，对港澳居民与东南亚侨胞所需的日常消费品，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到全部或大部组织供应与转口输出等<sup>⑦</sup>。

① 《南汉宸答苏联〈星火〉杂志记者 我国愿与各国进行平等互利的贸易谈判》，《人民日报》1952年4月3日 《就英国政府有关中英两国贸易问题的照会 我章汉夫副部长发表声明》，《人民日报》1952年7月19日。

②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Prepared by the NSC Planning Board”，Mar 3, 1954, *FRUS*, 1952 - 1954, Vol. 14, China and Japan (in two Parts), Part 1, p. 371.

③ “British Ships on Bare boat Charter to Companies Controlled by Chinese Communist”，Jan 18, 1954, FC1121/8, FO371/110274.

④ “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 No. 91”，Dec 21, 1953, FC1106/8, FO 371/105238.

⑤ 王红续 《毛泽东时代的中英经贸关系》，博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1999年，第81—82页。

⑥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83页。

⑦ 欧阳湘、唐富满 《从内地对港澳地区的出口供应看中国共产党的港澳工作方针（1949—1978）》，《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10期。

中国内地驻香港机构华润公司、华夏公司、德信行和五丰行为采购和运送国家物资、供应香港农副产品提供组织保障。加强对内地私商的领导工作，“鼓励其直销远洋并组织他们多与国外联系”，“给与代销商较高之佣金”；对于香港私商，则充分利用，“保证货源之供应或签订委销合同，给予一定利润，以扩大出口，打开远洋贸易”<sup>①</sup>。这些做法的意义在于：第一，即便在贸易危机升级阶段，中国政府也未考虑过用武力攻击香港，暂时搁置香港治权问题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一贯主张，这有利于缓解英国政府对香港防务问题的担忧；第二，香港作为新中国发展外贸事业的重要通道贯穿于危机前后，而保障内地对港市场出口供应又是维护香港社会稳定繁荣的重要前提，内地不会轻易中断对港供应，英方逐渐领会到中方将香港政治统治和经贸往来问题区分处理的意图。中共中央对香港政策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结合的方针，为中英香港经贸问题的协调奠定基础。

英国从默许香港航运公司分离船舶“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做法，到批准香港制造业启动更多的“例外程序”，得到了英联邦成员国和部分西方国家的支持，东南亚多国立即采取了类似做法。此后，英国开始劝说美国应建立新的战略机制来遏制社会主义阵营发展，而非单靠孤立片面的贸易管制。只有通过发展香港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才能避免香港向中共靠拢。将香港打造成西方遏制共产主义“桥头堡”的主张，得到美国决策层的认可。<sup>②</sup> 1954年6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了NSC152/3号文件，香港列入美国特殊的贸易管制区域，这表明美国承认香港同中国内地经贸联系，成为美国放松对港贸易管制的开端<sup>③</sup>。同年8月，英国将35%的“1B”类货物列入香港一般许可证中，香港贸易管制逐步降到1949年以前的水平。

贸易危机的缓和助推香港经济复苏，一个重要指标是香港进出口贸易额的恢复。在经历连续三年下降之后，香港在1955年迎来进出口贸易额的回升（见表1）。内地一直是香港最重要的进出口来源地，而香港贸易管制的主要目标是内地，因此1954年以前香港对内地贸易走势基本与香港进出口贸易变化一致。但全面禁运期间，香港对内地贸易值比重呈下降趋势，这一方面源于美国、日本等几大经济体加入香港市场竞争，挤占了国货在港空间；另一方面内地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形成，外贸倒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内地对香港总贸易额短期难实现反弹（见表2）。从这个角度看，经历过贸易危机后的香港转口港地位下降。

表1 1950年至1955年香港对外贸易总值

年份	贸易总值		进口		港产品出口（包括转口）	
	金额（亿港元）	比上年±%	金额（亿港元）	比上年±%	金额（亿港元）	比上年±%
1950	75.03	+48.0	37.88	+37.7	37.15	+60.2
1951	93.03	+24.0	48.70	+28.6	44.33	+19.3
1952	66.78	-28.2	37.79	-22.4	28.99	-34.6
1953	66.07	-1.1	38.73	+2.5	27.34	-5.7
1954	58.52	-11.4	34.35	-11.3	24.17	-11.6
1955	62.53	+6.9	37.19	+8.3	25.34	+4.8

资料来源 《香港经济贸易统计汇编（1947—1983）》，第27页。

① 《1955年度对港澳及东南亚出口工作安排方案》（1955年），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26-1-19-033-047。

② “Trade with China”，Jul 29, 1953, FC1121/21, FO371/110275。

③ “Report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Lay)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Jun 18, 1954, FRUS, 1952-1954, Vol. 1, Gene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Matters (in two parts), Part 1, pp. 1207-1210。

表2 1950年至1955年香港对内地贸易值

年份	贸易总值			进口			港产品出口 (包括转口)		
	香港对内地 贸易总额 (亿港元)	内地占港 总贸易额 %	比上年 ± %	自内地 进口 (亿港元)	内地占港 总进口 %	比上年 ± %	对内地 出口 (亿港元)	内地占港 产品出口 %	比上年 ± %
1950	20.43	27.2	+73.4	7.83	20.7	+32.0	12.6	33.9	+34.5
1951	24.67	26.5	+20.8	8.63	17.7	+10.2	16.04	36.2	+27.3
1952	13.5	20.2	-45.3	8.3	22.0	-3.8	5.2	17.9	-67.6
1953	13.97	21.2	+3.5	8.57	22.1	+3.3	5.4	19.8	+3.8
1954	10.83	18.5	-22.5	6.92	20.1	-19.3	3.91	16.2	-27.6
1955	10.8	17.3	-0.3	8.98	24.1	+29.8	1.82	7.2	-53.5

资料来源 《香港经济贸易统计汇编 (1947—1983)》，第53页。

## 五、结 语

总体来看,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贸易危机,是冷战格局下美国遏制共产主义发展的一次较量,也是英国维护在港利益的一次策略调整,更是新中国“反封锁、反禁运”斗争中的重要一环。毋庸置疑,中英美三国力量左右贸易危机的进程。一般认为,战后英国因国力衰微而实行战略收缩,在远东问题上处处以美国的战略目标为自身外交的主要考量。但可以看出,至少在1954年以前,香港贸易问题的主导权仍掌握在英国手中。从有限禁运时的拖延策略,到全面禁运后采取消极对抗,再到率先放宽贸易管制,英国从未完全受制于美国,甚至与香港和英联邦成员国达成高度的一致,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制裁威胁。英国在香港事务上仍保持相当的影响力与话语权。中国也在贸易危机中意识到英美两国的裂缝,英国重视对华关系与美国敌视中国的分歧在危机期间显露无遗。<sup>①</sup>中国认识到香港留在英国手中的优势,并将其当作分裂英美联盟的切入点<sup>②</sup>。

此次贸易危机也是香港长期从事转口港贸易的一次转折点,香港作为内地外贸立足点的地位受到冲击。然而,即便在香港贸易管制最为严厉的时期,中英在香港的贸易业务也未曾中断过,波动性和延续性成为危机背景下香港贸易的重要特征。

中英在港贸易的延续性特征较为突出,这主要与地缘政治、中英两国国情和香港特殊性有关。从地缘政治看,中国内地与香港地理关系决定贸易难以中断。香港背靠内地,即便由英国管制,其发展也离不开内地的支持。香港是水深港阔的天然良港,粤港之间绵长的海岸线和众多礁石,为突破禁运防线提供有利自然条件。香港还是中国内地与东南亚联系的重要节点,东南亚华侨、香港同胞与内地频繁的联动,更为运输创造诸多的可能。从两国国情看,中英国内政局为香港贸易提供巨大发展空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民经济亟待恢复,新政权须得到国际社会认可,赋予香港开拓海外市场和采购重要物资的职能,为国家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战后英国同样需要重振经济,提振国民信心,香港是维护其在远东利益的重要载体,维持香港和内地的贸易有助于日后英国进军

<sup>①</sup> Chi-Kwan Mark (2009). "Lack of Means or Loss of Will?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Decolonization of Hong Kong, 1957 - 1967",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31 (1), p. 47.

<sup>②</sup> Priscilla Roberts, John M. Carroll, (2006). *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p. 118 - 119.

中国市场。再者，香港地位的特殊性是香港贸易持续的动力。中英两国各自在香港编织了亲共和亲英的商业网络，无论是老牌英商还是在港党企，抑或爱国港商，彼此间商业利益早已紧密交织，这种独特的关联决定了中英在香港贸易关系中难以切断。

香港贸易的波动性，与中英关系变化密切相关。1949年以来，中英均注意到彼此贸易关联，并重视香港作为转口港的特殊意义，从这个层面讲，中英两国的经济利益目标具有一致性。但从政治目标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处理对外关系的原则是外贸服务于外交，在出兵朝鲜和台湾问题上，中国政府绝无商量余地。而英国此时既要维护英美关系，又要留心香港防务安全，前者有利于后者目标的实现。因此，当中英两国政治摩擦大于经济诉求之时，英国就会提高对香港贸易管制，贸易危机升级；当经济动机盖过政治分歧之时，香港贸易管制就会松动，冲突得以化解。香港贸易危机正是在中英两国政治经济利益相互对冲中不断调适状态。从这点看，在两极对抗的环境下，作为东西方阵营中地位仅次于美苏的大国，中英并没有依循美苏进攻式策略，而是依托香港的“减压阀”作用处理彼此关系，成为全面冷战格局下的局部松动。

香港贸易危机是亚洲经济冷战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对中英两国的香港政策也产生深刻影响。中国领导人感受到香港在新中国外贸中的联通优势和外交中的分化作用，对香港问题的决策逐渐清晰。在从1949年的“暂时不动香港”设想到20世纪60年代逐渐形成“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方针的过程中，贸易危机阶段对香港的谋划思考起着关键作用。对于英国而言，遏制住经济战势头有助于香港战后恢复，也让英国及其远东殖民地受益。禁运造成的贸易萎缩促使香港经济结构转型，美国逐步重视香港的战略地位，并拉拢日本等进军香港市场，降低了英国在港经济影响力，香港逐渐演变成大国角逐和重要经济体竞争的赛场，香港政治经济局面进入新的阶段。

(本文作者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朱昌裕)



## 《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2期要目

- |                       |                           |
|-----------------------|---------------------------|
| 再谈国史分期问题(朱佳木)         | 全民动员:南京市解放初期的卫生防疫         |
| 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的认识与评析 | (张慧卿)                     |
| (高晓林 黄冰琼)             | 1949—1956年中国赴苏参观代表团研究     |
|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优待劳动日研究    | (肖钊 罗玉明)                  |
| (王玲)                  | 1949—1966年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在中国的出版 |
| 三线建设中的土地征用问题研究        | 与大众阅读(杨林)                 |
| ——以四川816工程为例(秦颖)      | 公安部队领导体制的调整与变革(1953—      |
|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有线广播站的初期建设    | 1958年)(姬文波)               |
| ——以江苏省为例(1955—1957年)  | 海外视域下的中国贫困治理研究            |
| (马瑞)                  | (付正 刘纯一)                  |